

Russell Jacoby



The End of Utopia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n Age of Apathy

乌托邦之死

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

[美] 拉塞尔·雅各比 / 著

姚建彬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Russell Jacoby



The End of Utopia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n Age of Apathy

乌托邦之死

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

[美] 拉塞尔·雅各比 / 著

姚建彬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 / (美) 雅各比著; 姚建彬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80225-334-6

I. 乌... II. ①雅... ②姚... III. 思想史—美国 IV. B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9869 号

乌托邦之死: 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

(美) 拉塞尔·雅各比 / 著 姚建彬 / 译

责任编辑: 许 彬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巍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960 × 1300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4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一版 200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 001~6 000

书 号: ISBN 978-7-80225-334-6

定 价: 31.5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致 谢

像往常一样我根据需求和选择,将致谢写得非常简洁。我要向两位最为勤奋、最为投入的审稿人纳奥米·格劳伯曼(Naomi Glauberman)以及布瑞安·莫顿(Brian Morton)表示最深的感谢;我要感谢保罗·布瑞勒斯(Paul Breines)、罗伯特·布瑞勒(Robert Brenner)和罗伯特·希尔(Robert Hill),他们对本书的不同章节进行了评论;我更要为斯蒂夫·弗雷泽(Steve Fraser)承接了本书,为基础书局的乔·安·米勒将此书留下而对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前 言

在我撰写本书的这些年里,美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包括对陆军中的强奸、空军中的通奸以及白宫不合适性行为的指控。而在某位体育界名人因涉嫌谋杀妻子而接受了轰动一时的审判后,这些指控更加激烈。当然,所有这些事情并没有穷尽这个时代的新闻。然而其他的事件,诸如福利规章的变化或者反对烟草公司的案件的审结,并非特别吸引人。让我们不妨大胆做出如下概括,世界局势已经变得同样地乏味或压抑;其典型特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其一,向着欧盟迈进;其二,宗派主义引发着流血冲突和国家的土崩瓦解。

自然,任何人都能够拟订一份要么强调积极面的清单,如北爱尔兰的和平协定,要么强调否定面的清单,如艾滋病在非洲的传播。尽管政治已经变得十分沉闷,但是它并不意味着温和。在最糟糕的情形下,政治是由经济滑坡、暴政和自相残杀的暴力来界定的。最好的情形则是自由主义的政权抗拒了由倒退的宗教的和民族主义的运动发动的挑战。我们日益被要求在现状或某种更加糟糕的东西之间做出选择。其他的替代物似乎根本不存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默认(acquiescence)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少期望未来将会脱离目前的轨道。我们就这样来建设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职业。

换句话说,乌托邦精神,即相信未来能够超越现在的这种观念,已经消失了。最后这个看法存在直接引起误解的危险,因为乌

托邦 (*utopia*) 在今天意味着缺乏时代性 (*irrelevancies*) 或流血 (*bloodletting*)。相信乌托邦的人普遍被视为总想吃午餐或总想杀人者。我在此所使用的乌托邦的 (*utopian*) 一词,指的是其最宽泛、最少威胁性的意义:即认为未来可能要从根本上优于现在的一种信念。我指的是如下这种观念,即生活、工作,乃至爱情的未来特征 (*texture*) 可能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些事物甚少相似之处。我将如下看法同这种观念联系在一起:历史包含着自由与快乐的诸种可能性,它们几乎还不曾为人叩击。

但是这种信念如今却已完全死掉。甚少有人想象未来,认为它不过是今天的复制品而已,这复制品有时候比今天稍微好些,但是一般而言要比今天糟糕。从学术上对苏联的瓦解所作的结论认可了对激进主义的失败深有感触的这种情感。出现了一种新的一致性看法:不存在其他选择。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政治衰竭和退步的时代的智慧。

上述这些观点不仅渗入全部生活之中,而且还为此付出了代价。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世界似乎已经不那么令人迷恋。在欧洲与美国的富裕之中,前景看起来非常暗淡。最近,有人将欧洲富裕国家出生率的急剧下降等同于一种新的犬儒主义和悲观主义。年轻的成人担心阴云正在聚拢。一位瑞典专家在解释瑞典出生率下降问题时指出:“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人类行为的根本性转变。”坚信未来将会比现在更加美好的这种信念已经消失了。“如今的年轻人似乎持有如下这种观念,为今天而活着大概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拥有孩子似乎是太冒险,而且花费昂贵的事情。这份报告总结说,“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对以前的数代人来说是可能的事情,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已经不可能了,即便是在瑞典和意大利这样极为不同的国家,都具有这种相同的认识。”〔1〕

〔1〕《人口内向爆炸令正在老龄化的欧洲担忧》(“Population Implosion Worries a Graying Europe”),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98年,7月10日,第A1版。

正在下降的出生率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我所关心的是消沉的理智洞察力和雄心。在本书中,我绘制出了文化倒退的曲线图:激进派已经丧失了其刺激性,自由主义者丧失了其骨气。在历史的优势力量或历史的经验面前,倒退并非不光彩的事情。我曾经在一本探讨被打败了的传统的书中指出,传统的失败“记录了各种力量的配合,而不是洞察力、理论,甚至惯例的配合”〔1〕。为了返回画板,即为了重新考虑过去,那些传统都是值得尊重的选择。难题不在于传统的失败,而在于思想的疲倦与装聋作哑,即假装每向后或者朝边道退后一步就标志着前进十步。有关多元文化主义的骗局就是一个主要的例子。重新回到熟悉的多元主义被描述为观念上和政治上的突破。

在另一个新世纪的黎明,萨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写信给他的朋友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两百年前,即1799年,他向华兹华斯提出如下建议:同广泛的精神不振和顺从竞争。“我希望你能够用素体给如下这些人写一首诗,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完全失败,他们已经抛弃了对人类改良的一切希望,正在堕入一种差不多是享乐主义的自私之中,在对家庭的依恋和对想象性哲学的蔑视这种软弱的名号之下,掩盖了同样的享乐主义的自私。”〔2〕尽管我没有写过诗,但是我很乐意想象,就其对于想象冲动的捍卫而言,这本书能够部分地实现柯勒律治的请求。

1999年1月于洛杉矶

〔1〕《失败的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Dialectic of Defeat: Contours of Western Marxism*),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年,第4页。

〔2〕《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书信集》(*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E. L. 格里格斯(E. L. Griggs)编,第1卷(1785—1800),牛津:克拉任顿(Oxford: Clarendon),1956年,第527页(无日期,约1799年9月10日)。

代译序：乌托邦的存在与“终结”

刘象愚

“乌托邦”一名滥觞于英国著名作家托马斯·莫尔的小说《乌托邦》。莫尔将希腊文的“没有”(ou)和“地方”(topos)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拉丁新词 Utopia，意指“乌有之乡”。严复将其译为中文“乌托邦”，于是，“乌托邦”一词便一直在我国学界流传至今。

莫尔在《乌托邦》(1516)一书中，虚构了一个大西洋中的岛国“乌托邦”，借一位异教徒水手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将乌托邦描述成一个完美、理想的国度，那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贫穷，没有堕落，物质充裕，环境优美，人人每天工作六小时，在饮食、医疗、教育、学术、娱乐等各种公有的体制中，享受自由、幸福的生活。

莫尔的用意是表达人类对美好、完满的社会理想的向往，同时也批判现实的罪恶与黑暗。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美好的社会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然而它却可能存在于未来的某个时代、某个地方。至于究竟怎样才能让这一美好的理想尽快成为现实，他懵然无所知，当然也就无法告诉我们。所以，他设计的“乌托邦”既是一个“美好的地方”(good place)，又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no + place)，由此看来，“乌托邦”作为一个概念，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两面性，正面的美好、完满和理想色彩与反面的空想、不现实和无法实现性并存。

许多西方作家都曾沿着莫尔的这个思路写过类似的作品，譬如，意大利作家康帕内拉在17世纪初出版的《太阳城》(1602)、英

国作家培根于此后 20 多年写成的《新大西岛》(1626)、美国作家贝拉米的《回顾》(1888)等都是这类乌托邦作品。此外,许多经典作家都把乌托邦因素融进自己的作品中,人们很容易想到塞万提斯笔下桑丘任总督治理的海岛、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德廉美修道院”、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的“慧因国”等等。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曾通过贡柴罗之口,明确地表达了这种理想:“在这共和国中我要实行一切与众不同的设施;我要禁止一切的贸易;没有地方官的设立;……富有、贫穷和雇佣都要废止;契约、承袭、疆界、区域、耕种、葡萄园都没有;……废除职业,所有的人都不做事,妇女也是这样,但她们是天真而纯洁;没有君主;大自然中的一切产物都须不用血汗劳力而获得;叛逆、重罪、剑、戟、刀、枪、炮以及一切武器的使用,一律杜绝;但是大自然会自己产生出一切丰饶的东西,养育我那些纯朴的人民。我要照这这样的理想统治,足以媲美往古的黄金时代”。〔1〕

19 世纪之前,人们主要看重的是乌托邦的理想精神。

从时间的维度说,乌托邦理想在人类繁衍的早期就已经存在了。古代所谓的“黄金时代”就孕育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早在公元前 5 世纪,希腊哲人柏拉图描述的《理想国》正是后来莫尔《乌托邦》的雏形。“理想国”追求的是一个正义的社会,那里一切归公,男女平等,人人具有良知和道德感,社会秩序井然,人们过着一种质朴但安适的生活。尽管柏拉图的这个理想国并不绝对完美,那里仍然存在着等级区分,智者(即他所谓的“哲学王”)构成了社会的统治阶层,但这个高高在上的等级却是理智的、清廉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从空间的角度说,乌托邦的理想又不仅是西方的,而是全世界、全人类共有的,我国晋宋时代著名诗人陶渊明写出的那个与世隔绝的、仙境般的“桃花源”,正是一个和平、恬静、安适,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的乌托

〔1〕《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一)第 33 页。

邦社会。可见乌托邦理想是一种普世情怀、一种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古往今来,人们之所以这样执著地追求乌托邦理想,往往是因为现实太黑暗,太不完美。莫尔所处的16世纪的英格兰,一方面,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造成了贫富两个阶级的迅速分化,广大农民在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之后,丧失家园,或流浪乞讨,或在饥寒交迫中死亡,而新兴商人和资本家却在羊毛交易中获得暴利。另一方面,君主统治的专横跋扈,横征暴敛更加重了贫苦阶级的苦难。莫尔写作《乌托邦》的本意,固然是在表达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但也在通过对照,对当时英国乃至欧洲社会的黑暗、邪恶与弊端给与批判。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动乱的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火连绵不绝,统治阶层骄奢淫逸,广大农民流离失所,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诗人才刻意以这样一个想象的世外桃源的美好来衬托现实的黑暗和苦难。这样看来,“乌托邦”不仅是人类追求社会理想的象征,也是人类批判现实黑暗与罪恶的一种模式。

毋庸置疑,“乌托邦”是导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诞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乌托邦理想在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莫里斯等社会主义者那里发展到极致。例如,傅立叶笔下的乌托邦就是一个人们在性和饮食方面具有极度自由的天堂,在那里即便最贫穷的人也可以一日五餐,并有12种汤、12种面包、12种酒和12种肉与蔬菜的调料可供选择。然而,尽管他们提出了公有制、人人平等、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社会主义原则,勾画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然而,由于他们仍然不能提出实现这一社会理想的途径,因而他们的社会主义被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许多学者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显而易见,这里注重的是“乌托邦”一语的空想性质。

的确,20世纪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乌托邦”的难于实现,只能流于空想的一面。

20世纪人们似乎更多地看到了现实的黑暗面。两次世界大

战的浩劫、核子战争的威胁、极权政治带来的灾难、现代化与高科技产生的异化,凡此种种,都让人们对于乌托邦的理想产生浓重的幻灭感。这种幻灭和悲观的情绪生动地反映在文人创作的所谓“反面乌托邦”的作品和学者们对乌托邦问题的讨论中。

所谓“反面乌托邦”是指作家以尖刻嘲弄的口吻写出的乌托邦作品。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札米亚京的《我们》就是三部最著名的反面乌托邦小说。《美丽的新世界》中的乌托邦是500年后一个一切都处于高科技调控下的“美丽的”、“新”社会,尽管人的物质需求获得了较大的满足(全部居住在摩天大楼中;衣食无虞;交通工具全部是直升机;贫困、疾病完全被消灭;工厂生产效率极高;人根据自己被培育的模式从事各种级别的工作;在性生活[已经完全排除了繁衍的目的]、体育、娱乐、旅游等各方面获得了绝对自由,等等),然而,人从孕育、出生到老死的整个一生的种种活动又都完全处于高科技的控制下:在试管中按照不同等级(α 、 β 、 γ 、 δ 、 ϵ , 辅之以+、-)孕育、培养、受教育,从而被制造成适应各种工作(低级简单劳动、高级复杂工作,乃至政府领导层等)和不同等级的“人”。显然,作者的用意是要说明,现代化的科技和政府怎样操控了人,让人在物质生活(包括性生活)获得极大满足的同时却完全丧失了精神和个性,换言之,其目的就是要让人看到人怎样被异化(或曰物化),怎样丧失了人性,变成了非人。作品的寓意是相当深刻的,其挖苦的调子是相当响亮的。《一九八四》和《我们》同样讲现代科技和极权专制对人性的戕害,但它们似乎把批判的重点放在极权政治上。在一个完全是警察的国度里,人的一切言行(包括做爱)都处于严密监视下,人性彻底泯灭了,人甚至变成了编号的动物。从这些典型的反面乌托邦作品,我们不难看出,20世纪人们,特别是知识阶层,对莫尔式乌托邦理想的深重幻灭和悲观情绪,对人类社会未来改善的彻底绝望。

学者们对乌托邦问题的讨论始终是伴随着意识形态论争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对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提出

了挑战,也把一个严峻而必须回答的问题摆到了西方知识分子面前:人类社会究竟向何处去?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发展壮大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各种弊端的不断暴露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共产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似乎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与再度繁荣以及斯大林极权主义暴政的被揭露,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再次重建了对资本主义的信念。因此,20世纪50年代西方知识分子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是乌托邦理想的终结,而是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然而到6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内在的各种矛盾不断深化,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反战、黑人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却向这种“意识形态终结论”提出挑战。许多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再次认为革命依然是时代潮流,社会主义依然有美好前景,在这一争论中,双方保持的乌托邦理想并没有丧失。然而,到90年代,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89年东欧及苏联社会主义先后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使两种社会制度的争论似乎已经失去悬念,绝大多数激进知识分子彻底缴械,皈依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然而,在他们眼中,自由资本主义毕竟千疮百孔,充满弊端和不完美,人类的未来也许只能是现在的一种复写了。人们对政治和意识形态感到了十分的厌倦与冷漠,对社会改善与进步的乌托邦理想真正失去了信念。这次许多学者提出的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就真正是“乌托邦的终结”了,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雅各比这本讨论20世纪后半期政治与文化的著作才采用了《乌托邦的终结》这样一个标题。

拉塞尔·雅各比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的知名教授,专攻西方思想史,除本书外还著有《不完美的图像》(2005)、《最后的知识分子》(1987、2000)、《失败的辩证法》(1981)等书。在《乌托邦的终结》(1999)一书中,他旁征博引,清晰地勾勒了20

世纪以来美国思想界演化的历史脉络,围绕乌托邦理想问题讨论了美国知识界对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的态度,涉及了多元文化主义、极权主义、大众文化、知识分子、审美主义和地方主义等论题,并围绕这些大的论题做了详尽、历史的讨论。他的重点在论述20世纪西方的政治与文化,通过全方位的、多侧面的剖析,指出人们逐渐产生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厌恶与冷漠,从而丧失了乌托邦理想的精神过程,因此,他采用了《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作为副标题。然而,他的目的终究还是希望人们认识到这种精神状态之不可取,从而恢复自己对未来的政治热情与社会想象力。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曾向华兹华斯建议,请他写一首诗,呼吁人们从对法国大革命失败的悲观绝望中振作起来,重建对人类社会改善的崇高信念。雅各比借用这一插曲,期望自己这本书能够在部分上实现柯氏的这一呼吁。^{〔1〕}这本讨论当代西方思想与文化的著作,其书眼仍旧是乌托邦问题,而作者所谓乌托邦的“终结”自然也就包含了并非终结的意思。

雅各比这本书对处在思想与文化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无疑具有启迪作用,他提出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引发我们的深长思考;他描述的美国思想界的许多历史场景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镜。而我对于未来超越现在似乎比他怀有更为强烈的信念,我以为,冷静地看待社会与现实问题的同时又不丧失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作为社会精英层的知识分子必须抱持终身的原则立场。国人历来不曾丧失过对于社会进步的理想。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曾清晰地提出了“天下大同”的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

〔1〕 见本书“前言”结尾。

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庄周在有天下，无为自由的发挥、墨翟兼爱无等的分析，都是从一个特定角度阐发孔子的这一大同思想。近世康有为将这种理想表述在其著名的《大同书》中，尽管他提出的“破九界”〔2〕的观点有着更为浓重的空想色彩，但正是这种理想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之奋斗，为之献身。可以说，坚持一种理想，并为这种理想矢志不渝，终生奋斗，正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本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本文标题中的“终结”两字加上了引号。在我的心目中，乌托邦的理想精神是不该终结，也是不会终结的。

姚君建彬曾在文学理论专业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在我的名下研究乌托邦问题，最近他又带着同样的课题去剑桥大学访学。以他的专业基础和对乌托邦问题的了解与英语水平论，他翻译雅各比这本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他的译本即将付梓，应他之嘱，我写了上面一些关于乌托邦的感想，并祝愿他在未来的乌托邦问题研究中获得更瞩目的成绩。是为序。

丁亥年七月于京师园一得斋

〔1〕《礼记正义》（中），第658-59页。见《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康氏所谓“九界”，即“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业界”、“乱界”、“类界”、“苦界”。其中打破家族、种族、国家、性别界限，主张天下大同，一切皆平等自由的思想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十分相似，至于男女同栖不得超过一年，到期则须换人的提法则接近赫胥黎《美丽的新世界》中每天均可更换性伙伴的描写，其空想与荒谬，自不待言。

目 录

致 谢	1
前 言	1
代译序:乌托邦的存在与“终结”	1
第一章 意识形态终结论终结的终结	1
第二章 多元文化主义的神话	46
第三章 大众文化和无政府状态	103
第四章 知识分子:从乌托邦走向鼠目寸光	153
第五章 厚重的审美主义和稀薄的本土主义	190
第六章 零售健全与批发疯狂	236
译名对照表	276
译后记	301

第一章

意识形态终结论终结的终结

1955年9月,包括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和亚瑟·施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在内的数百名作家和学者,齐聚米兰国家科技博物馆(Milan's National Museu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共同探讨“自由的未来”。他们所持的观点大体上是自由主义的和反共产主义的,而他们的情绪,则是乐观向上的。当此之际,斯大林已经去世,新当选的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大谈国际关系等的缓和及和平;西欧和美国正呈现一派繁荣景象;马克思主义在欠发达国家也许拥有美好的未来,但是在其他地方却似乎已风光不再。一位与会者如是评论说,一种“胜利后的狂欢氛围”在这次大会上占据了上风。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指出:“人们坚信,在与西方观念的搏斗中,

* 雷蒙·阿隆(R. Raymond Aron, 1905—1983),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评论家。1928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哲学学士学位,1938年获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自由法国》杂志主编。1955—1968年任法国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社会学教授,1970—1978年任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授,曾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院长、法兰西伦理科学与政治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和高级社会科学研究欧洲历史社会学中心主任等职。50年代中期,阿隆猛烈抨击C.戴高乐总统,坚决支持美国领导下的西方联盟,积极反对殖民主义,提出法国应在阿尔及利亚爆发革命之前从那里撤出。主要著作有:《当代德国社会学》(1936)、《知识分子(转下页)

共产主义已经败北了。这种看法有时表达得很强烈,有时则表达得很平和。”〔1〕

在大会开幕式的演讲中,阿隆指出:“在大多数西方社会中,意识形态之争正渐趋平息”;历史已经“驳倒了寄托在十月革命中的、曾经被夸大的希望”。阿隆也承认,平等(equality)、就业(employment)、工资(wages)和通货膨胀(inflation)依旧引发社会关系的紧张,“但是这些问题激发的合情合理的焦虑并没有导致任何根本性冲突”〔2〕。严肃认真的人如今也都认可了福利国家的基本框架。

几个月之后,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

(接上页)的鸦片》(1957)、《工业社会十八讲》(1963)、《阶级斗争》(1964)、《社会学主要思潮》(1967)、《和平与战争》(1967)、《民主与极权》(1968)、《进步与幻灭:现代社会的辩证法》(1968)、《难以捉摸的革命:学生造反剖析》(1969)、《思考战争:克劳塞维茨》(1976)等。阿隆一直从事有关苏联和西方制度模式的比较研究,主张用经济增长而不是用社会关系的性质作为描述当代社会特征的核心概念,认为当代欧美社会是一种单一的工业文明的现实,苏联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只是同一社会发展类型,即工业社会的两种形式。他用“工业社会”、“工业社会诸类型”、“增长模式”和“增长阶段”四个概念说明现代社会发展的几个连续阶段,并认为现代社会必将超越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对立,走上以“生产力”(技术工艺和劳动组织)为中心的趋同道路。阿隆是主张“专家治国论”思想体系的理论家之一。——译者

〔1〕 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米兰来信:意识形态的终结?》(“Letter from Milan: The End of Utopia?”),《相遇》(Encounter),第5卷,1955年11月,第5期,第54页。本次大会是由文化自由协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资助的;很晚以后,人们发现本次大会及其某些出版物,诸如《相遇》,那时正在接受来自中情局(CIA)的基金,中情局竭力支持自由主义的反共产主义者。总体上参看彼得·科尔曼(Peter Coleman):《自由主义的阴谋:文化自由大会与战后欧洲的思想斗争》(The Liberal Conspiracy: 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Mind of Postwar Europe),纽约:自由出版社(New York: Free Press),1989年。

〔2〕 雷蒙·阿隆:《民族与意识形态》(“Nations and Ideologies”),见于《自由的未来》(The Future of Freedom)。这是由米兰的自由文化协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in Milan)所赞助的关于自由之未来国际大会论文集,1955(孟买:文化自由基金印度委员会,无日期)(Bombay: Indian Committee for Cultural Freedom, n. d.),第20—21页。